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图书版权贸易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刚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大家都面临“没米下锅”的困境,四处寻找滋养大众心灵的文学读物。《飘》就在此背景下出炉了。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直到1992年,中国正式成为这两大公约的成员国,逐渐发展起版权贸易。从以引进为主到近些年的引进与输出并重,版权贸易走过了一段漫长而不平凡的历程。在国家

“走出去”政策的支持下,从童书到文学,中国的原创作者和出版人正受到海外越来越多的关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很多出版机构借鉴版权引进过程中的经验,为输出原创作品开创了新路径。为呈现改革开放40年来版权贸易领域的发展变化,本刊特采访一些社的主要负责人,从他们从事版贸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一本(套)版权书谈起,讲述各社版权业务的未来规划。

《飘》的出版开启引进出版时代

■王晓乐(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汪逸芳(浙江文艺出版社编审)。



汪逸芳:经典爱情巨著《飘》于1936年6月在美国问世,很快畅销并获得普利策奖。1939年电影《乱世佳人》首映,引起轰动,并迅速风靡全球。随后几年,国内各大媒体争相宣传,傅东华首度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出版。

1979年是我刚进入浙江人民出版社(如今浙江人民出版社衍生8家出版社)的第二年。当时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读者迫切需要优质的精神食粮,可当时市场上的外国文学作品相当少,大家都处于没米下锅的阶段。上海书店的应子良带着傅东华版的《飘》找到我们。我和另一位老编辑被书里的那种奋斗向上、不向环境屈服的精神感染。当年10月出版了上册,通过全国新华书店发行,很快发行了60多万册。

在1980年初,这本书因反映美国南方农场主阶级生活的立场受到报刊尖锐的批评。当时的社领导和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马守良都拍板继续出,

在1980年4月出了下册。他们为这本书顶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次风波甚至惊动了国家最高层,1980年6月,美联社从北京发出一条电讯稿,邓小平告美友人,“《飘》可以出版”。

王晓乐:如今,《飘》的风波早已成为历史,邓小平关于《飘》举重若轻的讲话,冲破了重重禁锢,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的涌入,才有了中国出版业真正的繁荣昌盛。2019年是《飘》出版40周年,傅东华版《飘》已成为经典名译,浙江文艺社将隆重推出珍藏纪念版,来铭记浙江出版人的初心,以出版《飘》的情怀和精神去开拓创新,出版更多的精品力作。

1992年我国加入《伯尔尼公约》后,版权意识不断得到强化,版权贸易渐趋活跃繁荣。最初,版权贸易以引进和纸媒版权为主,21世纪初在各种国际书展上,中国的出版从业者都是版权引进最活跃的一群

人。现在,“输出”成了一个关键词,版权输出数量大幅增长;而且,由纸媒版权拓展到数字版权,甚至是全版权运营。由此折射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强烈的交流欲望,是互联网时代传播和交流日益频繁、形式日益多元化的体现。

近10年出版机构的版权引进比以往更加理智,购买版权更多地考虑是否与自己的品牌定位、产品线建设、长期规划相契合,在获取纸媒版权的同时,更加关注数字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致力于精品出版,多年来瞄准国际大奖作家作品,引进了博尔赫斯、奈保尔、库切等一大批一流作家的代表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等领域,莫言、阿来、格非、马原、沈从文等大批名家落户文艺社,为“走出去”打下了基础。继莫言全部作品落户文艺社后,阿来的“机村史诗”六部曲和《尘埃落定》全版权签约文艺社。我们期待着阿来笔下的中国乡村被更多国家的人阅读。

在“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浙江文艺社输出了王旭烽、艾伟等一批作家的作品版权。浙江文艺社作为优秀网络文学出版重镇,《甄嬛传》《芈月传》等作品版权成系列阵地地输出到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从引进到输出 声誉和品牌这样确立

■顾爱彬(译林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牛津通识读本”(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系列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从1995年开始出版的一套丛书。每本请一个领域公认的专家进行简洁而精炼的介绍。我们在2003年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协商购买这个系列的中文版权,后来与国内另一家出版社各选42本,一起出这套书。

为了做好这个系列,编辑动了不少脑筋,我们把它定位为“做成面向大众的通识读本”。我们请国内专家为每本书写序言鼎力推荐,并在2008年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随着合作的深入,目前我们共出了84本,未来计划一直做下去(牛津大学出版的该系列目前已有500多本)。

除了力邀专家写序言,打造最权威的通识读本外,我们还与南京大学合作,举办通识名家讲坛,向大众普及专业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我们在全国各大实体书店设立译林书架,陈列长销不衰的“经典译林”和“牛津通识读本”系列,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也树立了译林社的声誉和品牌。

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的版权贸易最为活跃。中国每年引进这么多海外的作品版权,说明改革开放

的影响之深之广,也说明中国的开放程度高、包容度大,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版权发展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译林社当时购买了《沉默的羔羊》中文版版权,是译林社购买的第一本国外的版权作品,也是最早一批履行版权合约的出版社。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译林社购买了很多国际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奈保尔、莱辛、库切等,可惜当时中国的市场还没发展起来,翻译出版后销售平平,但都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2006年后,中国图书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大家对版权也越来越关注。尤其是到了2009年后,随着转企改制的进一步深入,各家出版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也更加成熟。译林社也更注重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来甄选选题,现在国家推出的精品战略也更督促出版社精挑细选出精品佳作。

在版权引进之外,我们也更加注重实现版权输出。2008年,我们联合日本童心社、韩国四季社,邀请3个国家的12位一流儿童绘本作者,以“回

学术著作从精品引进到高品质输出

■龚海燕(华东师范大学社副社长)。



我1998年加入华东师大社,做版权业务已有20年了。我印象深刻的引进图书是1998年开始推出的“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这套丛书精选各国心理学界名家名作,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标准,有很高的学术品位。至今这个系列已推出近40种,超过半数多次重印再版,并获得了许多奖项。这是华东师大社第一次成规模地引进心理学方面的图书。从这以后,我们版权部深度介入选题策划,精选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名著、新作,从各方寻找作品的版权所有人。这与通行的成套引进的做法不同,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量。但也正是由于各部门通力合作,才打造出多套经典、长销的心理学、教育学译丛。

另一套重要的引进图书是“杜威全集”,共有37卷。我们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获得了版权。该中心在每本书前面均作了杜威研究思想的概括,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杜威的哲学思想。我们聘请了来自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当时称为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等全国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担任译者,确保了译文的

精准传神。这套经典的教育著作作为华东师大社立足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哲学》在我们社版权输出的图书中值得一提,它的德文版、俄文版、韩文版都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支持。作者朱志荣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德文版和俄文版的译者是著名汉学家——林小发(Eva L ü di Kong)是德文版《西游记》的译者,获浙江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学位;布罗夫·弗拉季连·格奥尔基耶维奇教授曾师从任继愈、侯外庐等著名学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造诣极深。在翻译过程中,作者不仅与译者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就书中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为译者在母语中找到最精准贴切的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为外译本修订补充了新的内容。在海外出版社的选择上,我们20年来积累了大量优质的海外合作伙伴。我们认为,把这本书交给专业的学术出版社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学术著作翻译难度大、耗时长,且通常为出版社的重点项目,因此提前“半步走”很重要。2013年我

10年间,引进输出格局显著变化

■鲁南(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合作部)。



我印象最深的是格非的《隐身衣》英文版2016年由美国纽约书评出版社出版。中国的严肃文学被英美的知名出版品牌接纳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此之后我们售出了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等版权,都是当地知名的文学品牌。通过这本书我们打开了与拉美出版社合作的大门。英文版和西语版出版后,国外主流媒体刊登了多篇相关书评和对作者的采访,随后外方出版社又引进了作者其他作品。一本书在海外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作品本身和国外翻译、编辑的努力,我们感到很欣慰。这也带动了更多作品在国外出版。

从2014年开始,人文社增强了与西语出版社之间的联系。西班牙语在欧洲和美洲广泛使用,然而西语市场对中文作品的接受度较英语、法语市场滞后很多,版权推广的起点低,潜力大。

人文社加大了在西语文学市场的推广力度。2014年我们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书展上做了中西作家对话活动,从2016年开始,每年派版权人员参加阿根廷、墨西哥或西班牙的书展,并组织格非、严歌苓、阿乙、葛亮等作家在当地举办了各种文学活动,不仅促进了版权输出,也加深了中国作家在西语读者心中的整体印象。通过与西语地区出版社

望二战,祈愿和平”为主题,在三国同时出版36本绘本,深受好评,多次重印。这个项目是全国首例“合作出版”项目,获得国务院新闻办颁发的“国际合作出版特别奖”,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资助”项目。该系列中的《迷戏》由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姚红创作,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还被改编为大型民族舞剧,是译林社抓住出版融合发展契机,推动IP运营向舞台、影视转化的成功尝试。

我认为,要做好版权输出,首先要对外国读者的需求做研究。国外人口基数没有中国大,所以输出图书的销量不会有中国这么大。我们要了解他们想读什么,与国外出版社联合开发适合国外市场的精品好书。

二是要做好原创作品,以此带动版权输出。从2017年开始,国家对精品生产提出了更高标准,这就要求出版社在版权引进时更优中选优,同时出版社也要提高原创出版能力。

译林社在去年2月成立了原创文学出版中心,聚集了李敬泽、方方、迟子建等一批名家作品,还集结中国80后、90后女作家的作品并推出“窈窕文丛”。明年还将集聚更多原创力量,推出更多佳作。译林社对编辑部门的考核也增加了原创出版、出版品牌建设等社会效益指标,鼓励编辑开发并集聚优质原创出版资源。译林社希望通过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原创出版能力,为文化“走出去”作出应有的贡献。

们对《中国艺术哲学》的学术价值和译介价值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制定了“走出去”计划。鉴于作者与德国学术界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我们决定先从德文版开始。林小发的加盟使该著作在西方的受关注程度得到提高,为德文版的启动带来了机遇。以此书为开端,华东师大社有多种社科著作的外文版本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支持,2017年有5种图书、6个语种的8个项目获得立项,2018年有14种图书、5个语种的11个项目获得立项。

目前我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推动图书“走出去”的支持项目,力度很大,这对于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借力政府的项目支持,促成更多本版精品力作走向世界。

华东师大社今年签订版权输出合约超过100种,但目前正式启动的只有近80种,其余的项目因为没有申请到资助而无法开展。在“走出去”方面我们一直以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但希望能更多地获得足够的资助,以保证项目顺利推进和结项。

数字版权将是我们明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我们将从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入手,对汉语以外的其他5大语种采取有步骤的推动,发挥主要语种的辐射作用,如开发外向型选题、合作出版以及与海外出版机构建立战略合作等方式,开拓“走出去”的新路径,持续“走进来”。

的频繁交流,我们输出了9部作品的版权,其中有3本书已经出版,并吸引了包括西班牙最大的报纸《国家报》的报道,其他作品也在翻译过程中。

在我从事版权工作的10年间,引进和输出的数量比和输出区域发生了显著变化。2009年我社每年输出10种版权,引进约150种版权。近期版权输出已连续2年超过百种,输出区域也从10年前的越南、韩国等周边国家,扩展到欧美、拉美、阿拉伯地区等。

文学作品输出版权,是向海外大众传播文化和思想的最好介质之一。但目前海外版权输出,尤其是严肃文学的输出很难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国外很多出版社,尤其是知名出版品牌,抱着尝试的心态出版中国文学,所以不愿意承担较大的风险。预付金普遍较低,翻译成本高,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海外版权输出如何能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收益,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困难。(下转第43版)

40年

我与一本书·版贸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渠竞帆

●王晓乐:网络作品往往裹挟着影视的热度,真正走入各个国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网络文学“走出去”,意义重大。如今“走出去”的形态也更加多样化。浙江文艺社从单品输出到一个门类的输出,正形成一个“走出去”的矩阵。要让“走出去”真正落地,首先贵在“走出去”,同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优秀的原创作品持续地支持,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消化。

●顾爱彬:我们做文化做出版,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一个赚钱多的行业,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出精品好书,同时我们还需要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坚守。

●龚海燕:我们将继续围绕“扎根中国教育出版,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目标,着力在产品、渠道、市场下功夫,实施4个“1+1”计划,即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将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相结合,将西方主流市场与“一带一路”及周边国家市场相结合,以及将数字版权与纸质版权相结合。

●鲁南:未来中国文学在国际市场上要达到一定的量,才能让海外读者意识到中国文学的每个时代都有好的作者和作品。另外,当代作家涉及的话题和观念将更加与国际接轨。希望尽最大力量让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出版。

改革开放40年特刊

我与一本书·版贸